

毛泽东 与现代人物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丛书

毛泽东与现代人物论

宋镜明 虞崇胜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鄂新登字 11 号

毛泽东与现代人物论

© 宋镜明、虞崇胜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师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21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2-1236-8/A·12

印数 1-1000 定价 5.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李新 孙思白 魏宏运

主编 张圻福

副主编 戴绪恭 陈善学 时元第 宋镜明 徐承伦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永松	元邦建	朱成甲	李良明	时
宋镜明	张圻福	张洪祥	张宝贵	陈
姜平	徐矛	徐承伦	须力求	韩
戴绪恭				

目 录

应重视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代序)	戴绪恭 (1)
全国第二次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	虞崇胜 (3)

青年毛泽东研究

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孙 康 (8)
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特点	张西山 (18)
青年毛泽东与新村主义	杨德才 (25)
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人生态度的影响	邓泽宏 (30)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传统文化含量	周凝华 文道贵 (38)

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毛泽东与文化书社	曾宪林 (42)
毛泽东对首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周兴梁 (49)
论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思想的一贯性	湛柏明 (62)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王雅文 (69)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汪佩伟 (75)
简述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几个观点	郑学祥 (82)
毛泽东的追求: 大体平均但不是绝对平均主义	虞崇胜 (88)
毛泽东创造性形象思维方式初探	宋 州 (101)

毛泽东与党内外人士关系研究

毛泽东同民主党派人士的交友之道	林浣芬 (108)
五四时期毛泽东与恽代英的友谊	李良明 (116)
首次国共合作初期的毛泽东与孙中山	何锦洲 (121)

应重视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

(代序)

戴 绪 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工委在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个英雄豪杰，他们对于促进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更是群星灿烂，群雄四起，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凝聚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精神风貌，他们是时代的先驱，民族的典范，在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中，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功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现代史，必须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人物。杰出的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与中国现代史紧密相联，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中国现代人物的具体研究，中国现代史将是一片苍白。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司马迁写《史记》，便有十二“本记”、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些都是人物研究。从《汉书》到《明史》，人物研究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历史学和历史书，主要是两种体例，一是编年史性质的通史、专史或断代史，另一种就是人物传记。而要写好人物传记，就必须深

入调查研究，详尽占有资料，对传主的生平、思想、活动客观地、历史地、科学地进行分析 and 评价。

当前，开展对中国现代史人物的研究，更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完全正确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研究中国现代杰出历史人物，弘扬他们的革命思想、高尚品德和精神情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坚信，这次会议以后，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1993年5月19日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绪恭教授在全国第二次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节录)

全国第二次中国现代史 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虞 崇 胜

1993年5月19日至22日，全国第二次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54位代表，共收到论文50余篇。几天来，与会代表围绕着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召开的，青年毛泽东的研究理所当然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青年学者张西山探讨了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特点，指出：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是他独具特色的主体素质作用于时代潮流与社会需要的重大成就，独立思考与“求实”“求真”是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精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是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重要课题，与时俱进、探索不止的人生观是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常新的关键。武汉大学孙康着重分析了青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的成因，认为青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既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有关，还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有关。总之，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既根植于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对资本主义仇视的民族情绪，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某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宽广襟怀。虞崇胜在分析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过程时指出，毛泽东所

以能够抛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国家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其驱动因素有：坚持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宗旨，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了依靠民众大多数的观点，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的。有的学者还将青年毛泽东与陈独秀等作了比较，指出他们各自思想发展的不同轨迹。安徽大学朱寒东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从总体上看落后于“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但他由于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坚决的革命态度，使他能够在1918年以后短短的几年里，从改良式的民主主义转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又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刘少奇语）；而陈独秀由于在接受唯物史观时保留了唯心史观的某些成份，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又未能彻底摒弃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致使他未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邓泽宏、周凝华等则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影响。从收到的论文和讨论的情况看，此次会议对于青年毛泽东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纵深阶段。

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也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曾宪林、中山大学周兴梁分别介绍了毛泽东创立文化书社、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武汉大学郑学祥、中南财大宋州分别探讨了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华中理工大学汪佩伟指出，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且最早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结束了自我封闭的被动局面，为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同时，他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外人士关系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何锦州、武汉大学宋镜明、何文、华

中师大李良明、复旦大学傅德华、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李代玲分别探讨了毛泽东与孙中山、李达、恽代英、于右任、续范亭的交往和友谊。华东师大杨雪芳的论文介绍了毛泽东与吴亮平的关系，披露了1973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吴亮平的评价。毛泽东说：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方法来治水的，吴亮平的功绩一是把《反杜林论》引进到中国来，二是把毛泽东、中共、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介绍到全世界。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就象大禹治水一样。福建师大林浣芬专门研究了毛泽东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交友之道，认为毛泽东同民主党派朋友、故旧的交往，是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品德、性格、智慧和情感以及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魅力。

中国现代重要人物的研究，仍是与会者所关注的课题。比如，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思想，五四时期的邓中夏、张国焘、李达、许德珩均有专文论述。宋镜明、何文在其论文中指出：以李大创、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李达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他们注意学习和运用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解决建党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对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党，都做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安徽大学徐承伦对朱蕴山四上太原，争取阎锡山联共抗日的历史性贡献进行了述评。辽宁大学葛仁钧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张闻天晚年的政治思想，强调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思想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值得着重提到的是，与会代表已经注意到研究经济文化界人士的重要性。上海大学张元隆具体研究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介绍了晏阳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平民教育宗旨、“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目标和从城市推向农村的平民教育重点。中南财大周华结合南洋烟草公司的盛衰变化，通过对其创办者简照南、简玉阶坎坷经历的叙述，论证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繁荣与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紧密关系。这样的研究方向，拓展了现代人物研究的范围，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现代人物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开展现代人物研究，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需要，而且也是研究现实的需要，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华中师范大学戴绪恭指出：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必须研究中国现代人物。离开了对活生生的现代人物的研究，中国现代史将是一片苍白。他还指出，重视人物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中便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从《汉书》到《明史》，人物研究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武汉大学虞崇胜指出，唐太宗的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开展人物研究就提供了两面，其意义不容低估。为了使现代人物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郭德宏传达了胡乔木生前关于开展现代人物研究的若干意见，并转达了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董谦对本次会议的嘱托。董谦强调，现代人物研究，今后要拓宽研究范围，延续研究时限，加强对1949年以来当代人物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关于现代人物的研究方法，苏州大学张折稿指出，现代人物的研究，既要克服那种离开历史实际，歪曲历史事实，人为编造历史的偏向，同时也要克

服那种就历史研究历史，一味追求“纯历史主义”的倾向。现代人物研究，只有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大背景下，与现实实际结合起来，与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四川师院谢增寿、南京大学姜平分别介绍了他们写作《张澜传》和《李济深传》的经验。郭德宏在其论文中结合自己参加《王明评传》等书的写作过程，着重谈了“真实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公允是人物传记的灵魂”、“丰富的材料是人物传记的基础”、“生动形象是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四点体会，使与会者很受启发。《人物》杂志社陈淑梅、南开大学张洪祥、复旦大学傅德华、辽宁师大马东玉则从认识论的高度强调了现代人物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上解释人物的历史活动；第二，要从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上反映人物的特殊性；第三，要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关系上正确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许多青年学者指出，人物研究，要力戒概念化、模式化，力求做到形象化、具体化。为此，必须加强对人物性格、心理乃至习惯、嗜好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弊端，使人物更加丰满、更为可信。与会者一致表示，现代人物研究，应突破过去重政治人物，轻经济、文化人物研究的偏向，加强对经济、实业、科技、教育、文化界人物的研究，以促进整个现代人物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次会议具体研究和初步落实了编辑出版《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丛书》的计划。本套丛书拟出50至100本，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李新作序，著名史学家孙思白题写书名，李新、孙思白、魏宏运担任顾问。现已出版《张澜传》和《李济深传》两本，已经落实写作计划的20余本。大家一致认为，出版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虽然有诸多困难，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预期目标的。

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孙 康

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的東西文明對峙，尤其在這種對峙下中國日顯落后的嚴峻現實，在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產生一種既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更要超越這種文明的強烈衝動。這種超越衝動成為 100 多年來中國志士仁人尋求民族獨立解放、繁榮富強的內在動力，凝聚成一種民族精神。我們把這種超越的衝動稱之為超資本主義精神。

20 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和精神導師毛澤東，在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這種超資本主義精神便表現得異乎尋常。正是這種超越的衝動，成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理準備，成為他後來凝聚全民族意志，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開辟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動力。

超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資本主義文明作為一個終極的價值目標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一個超越的對象，從而創造出一個更加美好的高於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近代中國人的這種價值取向，建立在對被超越者——資本主義文明的情感態度和理性認識之上，它構成了毛澤東超資本主義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閉目塞聽、冥頑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確實優越於中國固有文明。但是，若將與中國固有文明根本對立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作為追求目標，那就意味著對自身數千年歷史傳統的全部否定，意味著跟在列強後面爬行。這種自我否定，對於有着自己一系的文化傳統，福

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①。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 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压迫、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李大钊透过帝国主义“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②，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苦』的。”^③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疑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

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毛泽东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毛泽东生当强敌四逼、国将不国的危难之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少年时代便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他怀着匡济时艰、挽救危亡的大愿走出韶山冲，寻找民族的解放之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②“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③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使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若将救国救民的壮志付诸实践，必须知己知彼，必须对资本主义文明上升到理性认识。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文明以文化批判为主，对“物质文明之弊”等异化现象多有指斥。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④在1917年——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⑤他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有无尚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⑥在这里毛泽东将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极为浓重，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价值：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当中，必然导致后来的“双重”改造，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超越精神已隐含其中。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毛泽东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

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批判。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⑩。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⑪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深感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⑫如果说毛泽东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⑬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做洋媚外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

求出一种新的社会出路。

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④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⑤。“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政治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理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关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⑥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